

大秦国全录

[德]夏德著

朱杰勤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大 秦 国 全 录

[德]夏 德 著

朱 杰 勤 譯

商 务 印 书 馆

1964年·北京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and Hongkong: Kelly & Walsh

1885

Reprinted in China

1939

大秦国全录

〔德〕夏德著 朱杰勤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装

统一书号：11017·207

1964年4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18千字

印张 5 4/16 印数 1—3,000 册

定价(9)0.75元

譯者說明

德人夏德 (Friedrich Hirth) 于 1885 年所著《大秦国全录》或称《中国与罗馬东部》(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一书是中西交通史的名著。他以我們习見的中国史料，来考证古代大秦与我国的关系，且指出大秦即罗馬东部，亦即包括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細亚，且以叙利亚为首。(这本书发表后，在汉学界中引起热烈的爭論，除西方汉学家外，日本学者：如已故的白鳥庫吉、藤田丰八及当代的宮崎市定教授都有論文各抒己見。)

我国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学者，如馮承鈞、張星烺、岑仲勉及齊思和等亦均有考证文章发表。关于大秦究竟在什么确切的地方，目前史学界还没有一致的結論，不过各方学者公认大秦无疑是指罗馬帝国范围。研究历史主要是认识和闡发社会发展的規律，区区地名的考证，本来无关宏旨。但如果有人能够力排众議，独抒己見，把几十年的学术上的悬案，成为定論，使千多年前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的綫索更为突出，在史学上也不是完全沒有用处的。

夏德之說只是关于大秦題目的众說之一，因为他立論較早，以后无论反对他或贊成他的都往往引用他的书。我把他这本书翻譯出来，目的在聊备一說，仅供参考。此书所引，有中、英、法、德、希腊、拉丁各种文字，且多出自僻书，难于稽考。我今不揣謬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譯而发表，錯誤之处，尚望讀者指正为幸！

书中間有罗列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史料的各种譯文，譯者不录，因此书的汉譯本乃为本国人而設，而我国学者当能閱讀祖国的古籍。因此譯者对于书中附注間有討論譯文地方，及有中国名詞

的解釋，专为西人而发，且为我国讀书人所慣見的，就省去不譯。史地考证必求精确，所以我在可能範圍內，采用逐句直譯方法，行文艰澀，在所不免，惟望讀者見諒。

这本书我于 1945 年在昆明云南大学用文言譯成，又于 1957 年复校于广州中山大学，最近应商务印书館之命，再以語体重譯一过，三易其稿，犹未愜意，可見譯事之難。本书附录的四篇有关的論文，是从另一刊物譯出。

最后，我要竭誠感謝商务印书館編輯部的同志。在此稿未付印前他們不憚煩地替我精細地校改一过，使它能够減少許多錯誤，得以与讀者見面，这是我永矢不忘的。

朱杰勤于广州石牌暨南大学

1963 年

目 录

自序	(3)
导言	(9)
史料	(26)
考证	(41)

由中央亞細亞至大秦的古代路線——犁靬与條支——安息
即帕提亚——关于安息的早期記載——关于安息的后期記
載——赫卡托普洛斯—木鹿城即安都馬基埃那——條支即
卡尔提阿——犁靬條支可能为塞琉西帝国——西海——卡
尔提阿湖中半島上的條支城——于罗国——由赫卡托普洛
斯至卡尔提阿的路線——阿蛮与斯宾——幼发拉底河与底
格里斯河及安谷——大秦的海港——庇特拉或犁靬——甘
英奉使的失敗——古代航行的速率——古籍中的犁靬——
犁靬條支的关系——华絲的貿易通路——通云南的路線
——汉人已知的尼罗河路線——由巴比倫至叙利亚的陆路
——米索不达米亚——《魏略》所載各路線的分析——大秦
屬国——澤散——且兰、思陶、汜复——迟散即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里亚)——出自印度傳說的女国——小人国——
摩邻及老勃薩——大秦故京——大秦拂菻的領土——大秦
城邑数目——大秦的獅虎——邮驛——中国古代商品——
琉璃——宝石貿易的中心叙利亚——紡織品——刺綉品——
大秦的絲业与中国絲絹的輸入——水羊的神秘——苏
合——熏陆——指甲花——蜜香紙——金銀之屬——底也
伽——鬼市——拂菻考——拂菻王波多力——大食国攻拂
菻——拂菻的医士——中国使节来羅馬的傳疑

語言学上的推究結果	(137)
附录	(141)
大秦是什么地方?	H. J. 阿倫(141)
对阿倫先生的論文《大秦是什么地方?》的答辯.....	夏德(146)
大秦及其屬國	H. J. 阿倫(150)
对阿倫先生的《大秦及其屬國》一文的答辯	夏德(153)
譯名对照表	(156)

目 录

自序	(3)
导言	(9)
史料	(26)
考证	(41)

由中央亞細亞至大秦的古代路綫——犁靬与條支——安息
即帕提亞——關於安息的早期記載——關於安息的後期記
載——赫卡托普洛斯——木鹿城即安都馬基埃那——條支即
卡尔提阿——犁靬條支可能為塞琉西帝國——西海——卡
尔提阿湖中半島上的條支城——于罗国——由赫卡托普洛
斯至卡尔提阿的路綫——阿蛮与斯宾——幼发拉底河与底
格里斯河及安谷——大秦的海港——庇特拉或犁靬——甘
英奉使的失敗——古代航行的速率——古籍中的犁靬——
犁靬條支的关系——华絲的貿易通路——通云南的路綫
——汉人已知的尼罗河路綫——由巴比倫至叙利亚的陆路
——米索不达米亚——《魏略》所載各路綫的分析——大秦
屬國——澤散——且兰、思陶、泥复——迟散即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里亚)——出自印度傳說的女国——小人国——
摩邻及老勃薩——大秦故京——大秦拂菻的領土——大秦
城邑数目——大秦的獅虎——邮驛——中国古代商品——
琉璃——宝石貿易的中心叙 利亚——紡織品——刺綉品
——大秦的絲业与中国絲絹的輸入——水羊的神秘——苏
合——熏陆——指甲花——蜜香紙——金銀之屬——底也
伽——鬼市——拂菻考——拂菻王波多力——大食国攻拂
菻——拂菻的医士——中国使节来羅馬的傳疑

語言学上的推究結果	(137)
附录	(141)
大秦是什么地方?	H. J. 阿倫(141)
对阿倫先生的論文《大秦是什么地方?》的答辯.....	夏德(146)
大秦及其屬国	H. J. 阿倫(150)
对阿倫先生的《大秦及其屬国》一文的答辯	夏德(153)
譯名对照表	(156)

自序

我虽然希望本书所載的各项研究，能够投合各国少數讀者的兴趣，但我必須承认，筆录研究結果时，是企图滿足德国的批評家而非任何其他国家的学者。我既然曾經在利特什尔(Ritschl)及荷普(Haupt)等大师門下研究过語言学的方法，因此我深深感觉到这些文章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在于选择与古代事实有关的权威的方面。我曾經常常不得不使用第二手的資料，这在幸而能置身欧洲皇家图书馆以进行他們研究工作的作家看来，是不能諒解的。因此，我必須說明，这些文章是在中华帝国的上海的忙乱生活中写成的；在为了证明我的論点，搜罗最必要的材料时，主要只好靠自本人有限的书庫所藏的中外文著作。对西方作家來說，这显然是个大缺点；援引中国的作家时，也几乎有同样的困难。因为对住在中国的西方学者，不管在个人进取方面提供什么样的便利，但如果因而就推論說，住在这个帝国内的外国人，可以輕而易举的接触大量的中国书籍，特別是那些只有购置机会才能获見的珍本，那就錯了。在巴黎、倫敦、柏林、慕尼黑或圣彼得堡的各图书馆中，可以找到所有重要和有趣的中文著作，在那里进行这一类的研究，自然容易得多。

我对于德国批評家还另外要表示歉意。我国的语言学家或会問道，你既能用本国文字写作，为什么用英文写作呢？为什么你舍弃熟练的德文而反用你自己拙劣的英文呢？我必須承认，未动笔时，已考慮两种文字中究竟选择哪一种，在一开始便使我煞費躊躇。但最后，由于实际的理由，决定冒受采用外文所会遭遇的一切

困难危險。这本书总得在一个地方排印，如果在德国付印，而我不在其地，则排印中国文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生許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在上海付印，则作者势必要去譜悉許多他过去沒有机会学习过的印刷技术。法人德·斯塔埃尔夫人(De Staël)說过，德文是我們應該用于思想的文字，英文是我們應該用于写作的文字；事情既是这样，我似乎最好接受她的忠告。德国的汉学家大多識英語，使我稍为自慰。我所引以为憾的，一般研究古典时代的学者，未必都是如此，因此我的文章中有些由于缺乏专门研究的而留下来未能解决的困难，将不能得到許多研究古东罗馬的鉴别专家的見教。

* * *

自上世紀初以来，汉学界对于中国旧籍中所載泰西国家“大秦”的問題，时有爭論。关于这个有趣的題目，我认为有待去做的工作有：

- 一 收集与此題有关的中国典籍中的文字。
- 二 把其中未經譯出的文字翻譯出来，并把过去譯文中譯得不够完善的部分加以重譯。
- 三 考证上項文字中所記的事实。

我对这些記載的解釋，使我断定大秦古国，中古时代称为拂菻的，并非以罗馬为首都的罗馬帝国，而仅是它的东部，即叙利亚(Syria)、埃及及小亚細亚；而且首先是指叙利亚。如果将大秦定为罗馬东部(Roman Orient)，則中国典籍所載的事实大部可以追寻，而且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釋，无須訴諸事未必然的臆說。如指为全帝国，或意大利，或古罗馬的任何其他部分，那么中国书上說法就与实际不符。我所讀的中国书，其中关于当时亚洲西部的地理，有相当正确的記載；如果把它們应用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那就必

如玉尔上校(Colonel Yule)在他的《契丹》(Cathay)一书中某处所說的成为“幼稚的胡言乱語”了。①

玉尔論及古代西方地理学家关于“秦”(Thinae)国的知识时說：“在知識不充分的情形下，把比較远而称霸民族的名称加于与它最邻近的隶属的种族上，和把这些最邻近的种族的特点移之于称霸的民族，是很自然的。我們把荷兰 Dutch 的名称专应用于我們邻邦的 Netherlands，亦与上例大同小異。”(《契丹》，第1卷，第63頁)同样的評語，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上古及中古的作者对于大秦拂菻的特点的意見。但我們必須再加說明的，統治民族(羅馬)的許多特点虽然見之于被統治的叙利亚，但中国人并不知道他們所知的大秦还受一个更大的大秦的統治。他們以为安都(Antioch)即大秦的首都；独擅繁华，在东方游历家看来，遙远的羅馬首都的偉丽被它所掩。玉尔有感而言：“虽有刘应(Visdelou)及德經(de Guignes)諸人的‘自信不疑的考定’，但中国人自己对羅馬帝国及其人民的看法，与叙述賽利亚(Seres)的古典著作中所述的中国人的見解，有一些显著相同之点。”他又說：“在这个事例中，研究的大对象确在他們的視野范围以内，沒有事实的錯誤，但其詳述的，仅乃在东陲所見的偶然事迹，往往远不是对象的真正特点。”后面我就要表明，这些詳細論述，只要限于仅仅指帝国的东陲，而不是指整个帝国，那么这些論述足够精确，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特点；玉尔最末一句話中所提出的缺点，并非中国載籍本身所具的缺点，而是那些坚持勉强把它們推及于整个羅馬帝国的人的毛病。叙利亚与

① 《契丹》一书全名为“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契丹及其通道》)，亦名东游从录，是欧洲中古时代关于十六世纪前中国的各种紀載，由玉尔編譯而成，初由英国哈克卢特学会出版，共四册，后由法兰西学院教授亨利·考狄 Henri Cordier 重新編定。——譯者

埃及既均为羅馬的行省，中国史家所記該地詳細特点，自然会透露羅馬人生活的痕迹；所可注意的，除了对这个地域的无可置疑的地形特色的叙述之外，在所有主要的方面，我們都可以找到东方的特色。

* * *

我曾滿意看到，这种研究的重要結果，从本书出书前所印样張所能受到的批述來說，頗为許多研究汉学的朋友贊許；如果在一般讀者方面也能得到同样的观感，我将深以为幸，自然，我深知还有許多有待努力的地方；还有許多問題，限于我研究的范围，似乎超过我所有的条件，因此或者全未涉及，或者沒有打算作明确的解决，我的同道們儘有从事研究得到解决的可能。

斐利普斯先生(Mr. Phillips)論及我的條支考說：“这是唯一我不能肯定接受的部分。有两件事还須作进一步的研究：第一，在所述的时代，Hira(旧譯于罗国)是否为盛产犀牛之地？第二，西海是否可以指 Bahr Nedjef(內惹德河)？條支一地为整个問題的关键。我在論大秦一稿中，也同你一样，考定斯宾为泰西封(Ktesiphon)，而斯罗为塞琉西阿(Seleucia)。”

关于西海問題，我以为发源于卡尔提阿湖(Chaldaen Lake)，由东而西，統括諸水，名为西海。《中国評論》(China Review)(第13卷，第358頁)有一通訊讀者，引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书(第1卷，第184頁)，謂在塞密拉密斯(Semiramis)統治以前，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經常泛濫于平原全地，汪汪如海。此外，馬苏提(Masudi)(A. Sprenger的譯本，第1卷，第358頁)說：“幼发拉底河水曾有最大部分取道于于罗(el-Hirah)；河床遺迹，也許仍可找到，它曾名为阿提克(Atik)(古代)。在奧馬(Omar)时代，伊斯兰教徒与罗斯坦(Rostam)曾大战于此，称为卡提西亚之战(battle of el

Kádesiyah)。那时，幼发拉底河于今称为内惹德(en-Najaf, Nedjef)之地流入阿比西尼亚海(即印度洋，此处指波斯灣)；海通到此地，驶往于罗国的中国和印度船舶都在此停泊”。在几頁以后，馬苏提又載阿拉伯征服者卡利德(Khaled)和一位于罗人的談話。卡利德曾要求此城派一年高智慧之人到他的營幕去，欲詢他們的情况。下面就是卡利德和那位于罗老人的会話：

“你們是阿拉伯人还是納巴提安人(Nabathaeans)?”^①

“我們是納巴提安化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納巴提安人。”

“你們到这里有多少年了?”

“三百五十年。”

“請問你見过点什么?”

“我曾見海上的船滿載信地 es-Sind 及印度的貨物深入这个地方；在你足下的地方，从前都被浪所淹没。看，現在我們距海岸已有多远，等等。”

至于犀牛，后汉书謂條支国“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无论把條支位于与上述之物有关的任何地方，或将條支的位置推到波斯灣海岸的更南端，都不足解决我們的难题；因为今天产生犀牛的国家，都完全不在問題之内。布累特什奈得博士(Dr. Bretschneider 以后简称布氏)在《中日札記》(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第4卷, 第60頁)中，欲将條支证为古波斯(苏撒 Susa, 百泄波里Persepolis)，主張在这里，犀牛一詞應該譯成水牛；因亚洲西部盛产水牛。但水牛与犀牛不同之点甚大，中国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經驗一定是熟知水牛的；而从古代或当时对安南种犀牛的詳細記載，也知道犀牛的情状；我当然不能相信中国作家会不能

① 夏德氏定卡尔提阿为條支，而納巴提安为婆鑑 Rekem，即汉名的犁靬。二者之关系見于下文考证栏中。——譯者

分別，混而為一。如果說我們沒有積極的證據可以證明卡爾提阿曾經出產過犀牛，但我也不知道古代作者說過那裡不出犀牛；因為今日所存的古代典籍，大都為信筆紀載的性質，不能指望它們對每種獸類的產生區域都有詳盡的描述。不論犀牛是否在卡爾提阿的動物中常占有顯著位置，但幼發拉底河下游附近曾經海潮泛濫的原隰，其為這種厚皮動物的良好產地，無疑不下於世界任何其他地區。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還是很不完備的；我對中國古代記載的正確性的信念，通過我的研究，更加加強了，我認為記載中所謂條支出犀牛一點，正如提喜阿斯(Ktesias)、普林尼(Pliny)或斯特累培(Strabo)所述出現於卡爾提阿獸類的一樣可靠。我們對於接近西方文明的那些國家的古代動物的知識是不是也有同樣可疑的地方呢？誰會到貝魯特(Beirut)附近的黎巴嫩(Libanon)山穴中去尋求犀牛的遺骨呢？可是就在那裡，實際卻發見了和野牛、熊、山羊、瞪羚及羚羊等一起的犀牛遺骨。〔參看夫拉氏(Fraas)著《黎巴嫩山三月記》(Drie Monate im Libanon, Stuttgart, 1876年, 第66頁)。〕布利姆(Brehm)曾提到沙爾丁(Chardin)在伊思巴罕(Ispahan)見過一头犀牛(Thierleben, 第3卷, 第52頁)，雖然我不能說明這種獸類怎麼會到那個地方的。

此書付印時，深蒙翟爾斯(H. A. Giles)及巴刻(E. H. Parker)二位先生的提示和協助，深為感謝。

夏德(F. Hirth)

1885年6月于上海

导　　言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編成。所謂日历，即每日的記載，被认为官书正史材料的主要来源。这些历史在处理历史人物中是不是公正，是否沒有“顛倒黑白，淆乱是非”，自然大部分依靠日历中的記載，但也要靠史家本人态度的公正。如果說改朝換代的时候，胜利的新朝还认前朝为革除的对象之时，那么我們当然很难望主持日历和纂修正史的人能够大公无私。但是从朝代改变和修史之間已經隔了一个世代，就沒有再作这样怀疑的理由了。就有一点，也許可以称之为史家的偏見的，就是把王朝的末代統治者，往往描写成不是极其愚頑，就是极其邪恶。所幸者，本书的主题几乎完全不受这类考虑的影响；尤其是要感謝正史的編排体例，凡見于日历中关于和中国王朝发生接触的外国的材料，都是抽出編集，按照地理区域独自成篇，所受史家偏見就更少了。

二十四史三千多卷，如果不是中国史家有条不紊地把关于外国的材料列为专傳，要一个欧洲学者在这样的浩繁卷帙中搜集有关題目的材料，是很費力的。例如我們在二十四史第一部司馬迁的《史記》中，有匈奴、西南夷及大宛（一般考定即为 Ferghana）等列傳。司馬迁（約歿于公元前 85 年）的地理記載，只限于那些曾和中国发生直接接触的近邻諸国。后来班固和他的妹妹班昭撰《前汉书》。班固死于公元 92 年，他对于中亚及西亚各国有更广泛得

多的知識。班氏關於地理各章，已有譯文^①。這些作品，表露出自司馬遷逝世以來人們對地理研究的興趣；而班固的弟弟班超是當時著名的軍事旅行家，這一事實自然增加班固在這方面的興趣。班固大概會聽到他弟弟的遠征西部或中央亞細亞；但班超於公元102年回國時，班固已經去世。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許多必然是由班超遠征所提供的材料，不見於《漢書》而見於較後的《後漢書》。

《後漢書》為南朝宋（公元420—477年）范曄所編，為對亞洲西部諸國提供某些詳細記載的第一部權威著作，其中《西域傳》，成為後來歷代正史照例具备的一項，並以同一或類似的題名見於後代的史書之中。

《後漢書·西域傳》共有五百八十九字，為明代以前中國文獻中對極西的國家——大秦的第一次記載。書中所記關於大秦國的位置、邊界、首都、人民、物產、工藝的許多事實，且不說由後來歷史中所提供的任何附加的材料，如果不是有些研究這個問題的歐洲漢學家，不幸抱有偏見（他們認為大秦既為極西的最大強國，那麼必然就是以羅馬為首都的羅馬帝國全境），本來就足夠可以提供作為考定這個國家所在的基础。堅執此說的人，前有劉應及德經，近有布氏、愛德金（Edkins）及李希多芬（Richthofen）。我必須承認我一度曾抱有同樣偏見，二年前，我開始搜集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之時，目的就是想用以支持以大秦為羅馬及意大利之說。但不久我就發現，在把漢文記載仔細考察後，不單不能證我先前的見解，反而使我全部拋棄前說。在這些記載中提到“蘇合”（Storax）的製造，罕

① 卫礼(A. Wylie)在《人类学研究所学报》发表《匈奴与中国关系史》(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第3卷, 第401—452頁; 第5卷, 第41—80頁);《西南夷及朝鲜史》(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and Chaau-seen) 同上书, 1879年8月号。《西域杂記》(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同上, 1880年8月及1881年11月号。